

王刚义 王秀岩 杨青山 著

特殊孤儿
特殊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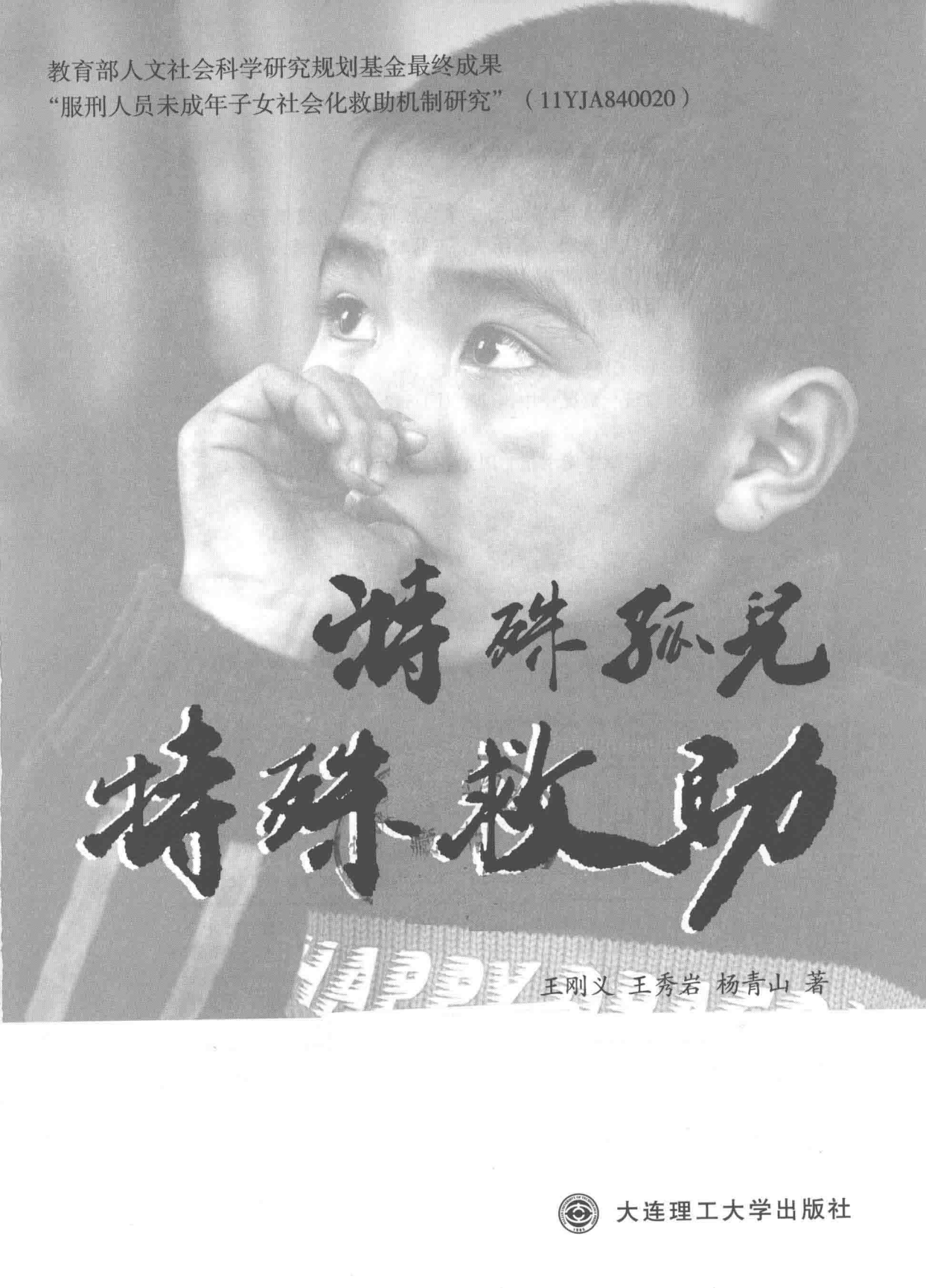
——来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第一线的视角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最终成果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化救助机制研究”（11YJA840020）



特殊孤儿 特殊救助

王刚义 王秀岩 杨青山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殊孤儿 特殊救助：来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第一线的视角 / 王刚义，王秀岩，杨青山著. —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11-9886-5

I. ①特… II. ①王… ②王… ③杨… III. ①儿童—社会救济—概况—中国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198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政编码：116023

发行：0411-84708842 邮购：0411-84703636 传真：0411-84701466

E-mail: dutp@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张：16.5

字数：325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婉

责任校对：千 川

封面设计：波 朗

ISBN 978-7-5611-9886-5

定 价：50.00 元

| 代序 |

王刚义——当儿童村村长的法学教授

在大连儿童村饱受质疑之时，王刚义出任“村长”。此后，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质疑声中。尽管如此，这位法学教授、昔日的“中国冰人”仍然执拗地坚持着。他相信，多建一个儿童村，就会少建一座监狱。

2013年10月10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韭菜房村的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以下简称“大连儿童村”）。此时，这座我国东北地区唯一专门抚养服刑人员未成年特困子女的民间慈善救助机构，刚刚结束了它的又一次搬迁。

虽然大连儿童村从诞生至今不过十年，但这已是它的第三个新家。

此次因房租上涨而导致的搬家，在大连儿童村村长王刚义看来，很是无奈。但他也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能为孩子们建起属于自己的家，不用再四处租房。”

如今，不少人依然记得：2001年，王刚义从辽宁省大连市出发，在南极长城湾下水，创下了在1.4℃水温中，游程1500米，水下持续时间51分42秒的基尼斯世界纪录。

之后，王刚义又创下冬季日本海冬泳、冬季横渡韩国汉江等四项基尼斯世界纪录。2007年，王刚义被评选为“2006CCTV十大体坛风云人物”，被称为“中国冰人”。

此后，王刚义似乎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鲜为人知的是，他把公司业务放到一边，又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只留下大连理工大学法学教授一职，接手了当时无人管理的大连儿童村。

接管儿童村

2007年，因儿童村善款使用情况受到媒体的质疑，原大连儿童村的负责人潘芷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临走前，她拨通了时任儿童村监事长王刚义的电话。在电话中，她希望王刚义能代替自己接管儿童村。

2005年，因参加公益活动，王刚义第一次接触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群体。此后，他被聘为大连儿童村的监事长。

当时，他查阅资料发现，截至2005年年底，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人，其中很多孩子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帮助。

2007年深秋，一次来自高墙内的托付，让王刚义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了剪不断的缘分。

在受邀去往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为服刑人员做报告后，一名服刑人员恳求王刚义帮忙打听自己的孩子是否还活着。

几经周折，王刚义找到了那个孩子。由于长期“混社会”，孩子濒临犯罪边缘。

“找到她时，说不清是震惊还是悲伤。那一刻，我只想照顾好这个孩子，让她和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回想起当年的情形，王刚义的眼眶湿润了。

2007年年底，王刚义从潘芒手中接过大连儿童村村长一职。

“几个原本活泼的孩子蜷缩在冰冷的床上。冰箱空了，灶台是冷的，锅里剩下一点面疙瘩，孩子们这样吃了好几天。”王刚义回忆。

而此时的大连儿童村，还笼罩在被质疑的阴云中。在《儿童村不能忘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风雨历程》一书中，王刚义写道，“那段时间，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儿童村，曾经门庭若市的儿童村好像突然被冰雪覆盖住一样……”

身为法学教授、律师，王刚义首先想到，要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给大连儿童村一个合法身份。

当时，国内许多民间慈善组织都是在未注册的情况下运行。大连市民政局一位主管领导劝王刚义打消接管儿童村的念头：“办儿童村风险太大，出了事谁也担不起。你作为监护人，弄不好，身败名裂。”

但王刚义没有听劝。

2009年年底，大连儿童村取得了由大连市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营业执照，其业务主管部门为民政局下属的社会福利处。

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王刚义坚持“多一个是一个”。2013年6月20日，在他的力推下，大连儿童村变更为大连市首家无主管部门民间慈善机构，专项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不过，直至今日，与王刚义相识多年的好友仍在劝他放弃儿童村：“（王刚义）最好见好就收。五项基尼斯世界纪录为他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放弃儿童村后，他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而在好友眼中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声誉,却被王刚义用来“借钱”。

在韭菜房村,王刚义一口气修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儿童村新居。除来自掏腰包和爱心人士募捐的资金外,儿童村还有二十几万元的欠款。

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欠款,正是王刚义靠“拍着胸脯承诺”得来的。

光荣与危险

大连儿童村副村长王秀岩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幼儿园。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第一次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到大连儿童村“献爱心”时,她误以为王刚义是儿童村的名义理事长。

“你一个月来儿童村几次?”王秀岩不假思索地问王刚义。

事实上,王刚义长期住在儿童村。除上课或其他重要事宜,他很少离开儿童村。因此,王刚义留给家人的时间很有限。

妻子王柳对他说:“只要你每天晚上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生病的时候能帮我叫个救护车就足够了。”

数次冬泳挑战后,受冰冷的海水影响,王刚义一度因脑梗而被送进了医院。康复后的他坚持认为,自己因为儿童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如果没有儿童村存在,可能我没有这么大的动力活下来”。

除了冬泳行家的身份,王刚义的个人履历上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退伍后的王刚义考入吉林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教书,成为了一名副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放弃了吉林大学的稳定工作,赴大连“下海”。据他所称,自己曾涉足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事业高峰期“经手上亿元资金”。

1999年,他考取吉林大学法学院,师从法学家张文显,攻读法学理论博士学位。接管儿童村前,他还是大连市某律师事务所主任。

接手儿童村的时候,也是王刚义事业的上升期,不少质疑因此而至。有人觉得,王刚义连赚钱的公司都不要了,是因为大连儿童村能带来更大的利润。

2012年,有人在网上发布长微博,宣称王刚义骗取爱心人士的钱财,生活在大连儿童村的孩子挨了打。

“刚刚接手时,我们就委托专业机构做财务审计工作。”王刚义说,这使得财务上儿童村有据可查。而对于孩子身上有“伤痕”的质疑,他解释,是因为孩子们接受了中医刮痧理疗。

同样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的志愿者盛添财,也曾在个人博客

为王刚义辩白。他写道：“儿童村是一个大家庭，二十多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要靠村长去解决，难免忽略一些细节。刚刚创建的儿童村，很多管理制度都要一步步完善和探索。”

王刚义也曾感慨，“这个事业，表面上光荣，实际是充满无数陷阱的危险境地。人们可以任意找出一点毛病攻击你，而且不容你解释。”

也是从被质疑时起，王刚义带领儿童村建爱心果园，经营饭店，希望能够摆脱单纯地依靠社会捐助的发展模式。

至于以后可能更多的资金需求，王刚义“准备创办一所国际化的‘全纳’幼儿学校”。在他的理想中，这所学校不仅接纳普通家庭孩子入学，同时无条件接受弱势群体的孩子尤其是服刑人员特困子女。“我希望从此使儿童村具备造血机能，最终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尊严的民间慈善机构。”他说。

村长的“名人效应”

在大连儿童村中，《法治周末》记者感受到，王刚义眼下正在按照心中理想建设儿童村。

庭院中种植着多种蔬菜，屋顶上盘旋着五十多只鸽子。在院落一角，则是猪仔和猫、狗的生活空间。清晨5点钟，孩子们自觉地起床跑步，打扫房间。在刚刚装修好的房子里，窗帘是白底碎花图案。

王刚义向记者介绍，房屋中的所有设计，都是出自儿童村“志愿妈妈”万轩竹之手。儿童村的后勤部长孙宗达因为听到王刚义在广播电台做的关于大连儿童村的节目，放弃月薪5000元的工作，来到儿童村专职给孩子们做饭。

如今，王刚义自己动手种地，甚至盖房子。与此前的一张冬泳照对比，他明显黑瘦了许多。

《法治周末》记者来到大连儿童村当日，恰有一位王刚义的老同学在儿童村帮忙。在老同学眼里，王刚义现在是“乐在其中”。

而在大连儿童村副村长王秀岩看来，村长王刚义的“名人效应”，在大连儿童村发挥了别样的作用。

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儿童村还有6个孩子没有户口，倘若不是王刚义，这些孩子很难被学校接受。至于每年由儿童村工作人员开车载着二十几个孩子，能够依次到辽宁省各个监狱“集体探视”，更是多亏了王刚义。

用王刚义的话说,对他而言“现在,教书授课是赚钱的主业,而儿童村则是花钱的主力”。

为了省钱,大连儿童村的门窗都是由建材市场拉回来的旧门窗改造而成。曾经对朋友慷慨的王刚义,现在也变得“抠门”起来。

“有时在外面办完事一起吃饭,他就拿不方便停车、赶时间等各种理由搪塞,最后总是请我吃一碗拉面了事。”王秀岩笑着说。

不过,当前困扰大连儿童村的,却不是孩子们能否吃饱穿暖的问题。“志愿妈妈”万轩竹告诉记者,因为缺乏人手,教育孩子成了最大的问题。

“仅仅停留在养活这些孩子,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人。”她说。

也因为教育难题,尽管王刚义希望在数量上能多帮助服刑人员子女,但目前他量力而行。

在《法治周末》记者采访过程中,大连市民政局相关部门承诺,可将大连儿童村的孩子们纳入大连市救助站的救助范围。不过,当记者提出,能否保证孩子们接受教育、去监狱探望父母,工作人员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王刚义表示,也正因为在意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他不能接受把儿童村的孩子们送去救助站。

在儿童村尚未完全建好的西院,王刚义指着院子里的红旗告诉记者:“我们走到哪里,就把红旗带到哪里。只要红旗不倒,我们就还有力量。”

“服刑人员的孩子是无辜的。帮助他们,能帮助他们正在服刑的父(母)亲安心改造。现在多建一个儿童村,以后国家必然能少建一座监狱。”王刚义说。

《法治周末》记者 闫格

2013年10月

| 目 录 |

代序

第一章 特殊孤儿的忧伤 1

一个看似边缘的群体的命运,折射的是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处境。一个好的世界不会凭空而来,它需要人人参与创建。

第二章 特殊孤儿人权保护的基础 16

根据出生地办理出生证书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这一类孩子的命运,更是提升我国人权保护水平的一大指标。

第三章 特殊孤儿救助组织与政府互动合作 31

应当实行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政策,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力量为补充的救助系统,使之成为全民的事业。

第四章 民办儿童村救助方法和管理模式创新 62

以多样化救助为切入点,打造人道主义救助、科研救助、爱心培育、亲情帮教、创业等五大基地模式,丰富民办慈善机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章 暴风雨中起舞的孩子 80

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未来注定要充满暴风骤雨和艰难险阻。所以,他们的人生,无法等到暴风雨过去,只能选择在暴风雨中舞蹈。

第六章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105

善款善用、善誉善用是慈善事业的生死逻辑。

第七章 心灵救赎之旅 123

在一个监狱里,有一个罪犯的孩子在儿童村,那么,感到有希望的是所有的犯人。

第八章 大连儿童村微博风波启示 145

当以一种理性的思考冷静地审视各种质疑的时候,恰是儿童村及身历其中的所有志愿者们成长、成熟、蜕变时刻。

第九章 让爱的种子撒向全世界 169

由儿童村所播撒出的蒲公英种子,已经背负着人性的善良与爱心,远洋过海。这里不仅仅是普通市民爱心传递的基地,也是培养慈善领袖的摇篮。

第十章 往前走,天就亮了 235

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让每个孩子的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障,那么,他们的生命价值才能得以发挥和实现。

第一章 特殊孤儿的忧伤

帮助这个社会中最脆弱无助的人,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我生活的内容,也是命运的安排。无论你遭遇什么样的不幸,向我呼喊,无论我身在何处,我将向你飞奔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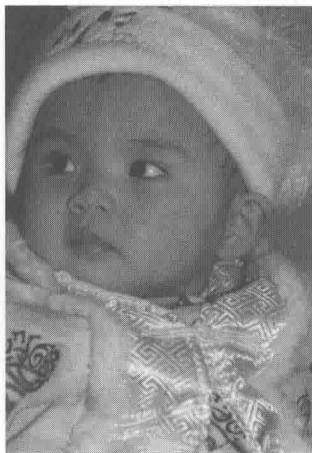
——英国王妃:戴安娜

他们是谁？

孤独、恐惧、无助……当我们谈论这些词语时，那往往不过是我们随处可见、垂手可得幸福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但不全是这样的，对于某些孩子来说，那却是生活里扑面而来的每个细节。

海美，一个像精灵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在她一周岁生日的时候，没有烛光 and 蛋糕，更没有亲人的祝福……从这一天开始，她的妈妈要撇下嗷嗷待哺的她，到监狱服 11 年长长的刑期了。而纵使她哭破喉咙也无法唤回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的妈妈。她根本也不会知道，她的父母并没有登记结婚，在中国户籍管理中，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来大连儿童村四年了，她有了好几个名字、好多个妈妈，但是她到底是谁呀？

海娃，在他十周岁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爸爸用尖刀刺进年轻美丽的妈妈的身体。妈妈在抢救途中，永远闭上了眼睛。爸爸锒铛入狱，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娃在学校被老师、同学们冷落甚至侮辱打骂，最终不得不辍学在家，和年迈的奶奶一起流浪乞讨。在远离他人视线的时候，他总是迎着山野的风狂奔，他喜欢奔跑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他都憧憬着遥远而美好的未来。



一周岁的小海美“漂”到儿童村

海辉，九岁时父亲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母亲随后改嫁，继父残忍地打骂虐待他，小小年纪的海辉有家不敢回，有学不能上，每天只能蜷缩在街头的柴火垛中或桥洞里，他被所有人抛弃，只能靠沿街乞讨艰难度日。当他被好心人送到儿童村时，已经养成了一身恶习，打架骂人成了家常便饭，由于辍学多年，早已没有学籍。

海妹，爸爸因抢劫被判入狱九年。狠心的妈妈将刚刚一岁多一点的她扔到荒山野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多亏被上山打野兔子的猎人发现才躲过野兽的牙齿。于是她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一次爷爷奶奶在去卖水果的途中，车翻了，海妹差点被车砸死。后来爷爷半身不遂，奶奶本来身体就不好，更是顾不过来小海妹了，没有办法就把她送到了大连儿童村。她

在儿童村已经生活九年了,不知记忆里是否还有亲人的模样。

海祥,八周岁,姥爷家在瓦房店老虎屯,父母因贩毒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11年有期徒刑。只有年迈多病的姥姥姥爷拉扯小海祥和仅有三岁的弟弟,没有经济来源的姥爷不得不把海祥舍弃在大连儿童村,卖了全部家当带着三岁的弟弟迁回黑龙江老家。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孩子,由于生活一次次的变故,亲人的相继远离,使他多了些许沉默与惆怅。

海洋,非婚生子女,12岁,是一个聪明过人的男孩。父母均是外地来连打工人员。10年前,爸爸因贪心盗窃电缆线,妈妈帮着销赃双双受审被判刑,这时只有两岁半的他根本无处可去,被留在办案的营城子派出所里,就在民警手足无措时,辖区诞生了“爱在海边”儿童村,即大连儿童村的前身,解决了办案民警的燃眉之急,海洋被送到了还没注册的儿童村,小海洋也成为儿童村首批村民。后来,当小海洋终于盼到父母出狱,憧憬着与家人团聚时,他得到的消息却是妈妈自杀,爸爸失踪。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没有身份意味着什么他也逐渐明白了。每当有人提起此事时,他都泪如泉涌。



海鸥、海美姐妹花

海鸥,14岁,爸爸犯罪被判入狱13年,妈妈再嫁,抛弃了她。4岁半的海鸥开始了流浪生活,白天她在街头要饭,夜里她露宿桥洞,幸运的是流浪一年多没被冻死饿死,被辖区街道送到了大连儿童村,在儿童村生活了10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了爸爸出狱,爸爸看了她一次,就去外地打工又失去了联系,海鸥只能眼巴巴盼望着。

海连、海光、海明三姐弟,原籍凌源,父母打工来到普兰店,老三海明是在普兰店打工时超生的,没办户口,成了“黑人”。妈妈患病突然去世,爸爸也因犯罪被判刑6年。姐仨感到天塌了,没有了主心骨,靠邻居和办案民警宋军送饭。后来,宋军联系到了大连儿童村,姐仨见到了光明。

海清、海静小姐俩,爸爸因冲动杀死了妈妈,被判死缓。天塌了,她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感到世界上所有人用异样眼光盯着她们,学校里要好的同学竟说出,“你们是杀人犯的孩子,我妈不让我们和你们玩。”

.....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正在监狱中服刑，他们被称为服刑人员子女。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在现阶段国家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的背景下，很多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因失去应有的家庭关怀和抚养教育而流落街头，成为新生代的弱势群体。



“老爸”王刚义赴普兰店“解救”三姐弟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监护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父母双方均因犯罪而服刑，或者父母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正在服刑，或者父母离异后，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母)在服刑，另一方不愿或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这时候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就无法落实，呈现无人监护的状态。他们赖以生存的载体——家庭——出现残缺甚至瓦解。本应生活在父母关爱下的未成年子女，失去了家人的关怀，其原本的生存、教育状态发生急剧变化，残酷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

由于他们法律意义上“父母”的存在，因此并不符合国家福利机构的收养和救助条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指出，“事实无人抚养”这一概念第一次被官方正式使用，是在2006年民政部、中央综治办等15部门《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中。遗憾的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意见采用了法律概念明确、边界清晰、认定程序相对简单的定义，未将“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纳入孤儿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他们本不应该是被繁华和进步所遗忘和遮蔽的群体。

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总现状鲜有调查数据披露。目前仅有的一份关于这个群体整体的调查数据是九年前，即2005年司法部课题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披露的。该报告以全国31个省(区、市)所有在押的有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为总体，对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分析得出，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在押犯总数的30%左右，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



自强不息的儿童村孩子们

子女总数逾 60 万。其中,94.8%的孩子并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生存状况堪忧。

这么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是谁?该不该得到社会救助,谁应该救助他们?救助他们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怎么救助他们,救助他们什么?这些问题,开始引起政府官员以及从事慈善活动的人们的思考。

沉默在尖叫

海辉被送到儿童村之前,这个 12 岁的瘦小男孩儿已在老家附近流浪了三年。海辉流浪的地方,也是他父亲被带上警车的地方。

父亲入狱没多久,他的母亲即改嫁。继父总是在醉酒后,像疯子一样对他拳打脚踢,从此他有家不敢回,流落街头。三年中,海辉一直通过乞讨或在垃圾箱里找食物,让自己不至于饿死。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在桥洞里过夜,到了冬天,他躲在柴火堆里瑟瑟发抖挨过漫漫长夜。

一些孩子与海辉有着类似的遭遇。《报告》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的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的 2.5%。令人担忧的是,多达 1/5 的服刑人员因为种种原因,不知道孩子现在的情况,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在社会上流浪和乞讨。

2012 年 8 月,在大连儿童村千里大探亲队伍在营口监狱探监的报告会上,一个年轻的服刑小伙站了起来,他说,“我有一个请求,可以抱抱这个小男孩吗?”他手指向了虎头虎脑的海浪。得到允许后,他疾步过去,紧紧地搂

过海浪，哽咽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他现在在哪里，如果，如果他还活着，就和他一般。”在场所有人闻言，无不泪如雨下……

2008年，在对浙江省宁波市某县进行调查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朱华燕发现：78.94%的服刑人员家庭月收入低于900元。

夏禹波、姜志荣的论文《青岛市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中提到，“80%的服刑人员入狱前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被捕入狱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灾难性的”。

儿童村还有三姐弟，海连、海光、海明。因母亲过世、父亲入狱来到大连儿童村。大连儿童村村长王刚义等人在孩子们的家中发现，“炕上的被子都是黏糊糊的，几乎见不到本色。除此之外再没有一样能称得上物件的东西。家里剩下的‘食物’就是两个臭鸡蛋和一碗长毛的大酱。三姐弟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

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而言，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学业难以为继，受教育权无法保证。

《报告》中提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辍学的人数占被调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的13.1%。被调查的11万余服刑人员中，其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前就已经辍学的占未成年子女辍学总人数的17.56%，在父(母)入狱后辍学的为82.43%。全国中小学生平均辍学率为1.28%，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平均辍学率为13.1%，父(母)入狱后未成年子女的辍学率更是大幅攀升。

在众多辍学原因中，因生活困难、无人照管而辍学的占辍学总人数的69.5%，因受歧视而辍学的占总数的15.5%。

沉重的标签

大连儿童村村长王刚义在长期救助工作中，意识到：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而言，贫困并不是他们人生最重的负累。“沉重地压在孩子们身上的，是‘父亲或母亲入狱’这个标签。”他说。“这枚标签如同一枚‘炸弹’，不定时地扰乱孩子们平静的生活，不断地对他们造成伤害。很多人从来不分析孩子的父母因什么原因犯罪，是家庭暴力还是经济问题。父母亲犯罪的情况虽然不一样，但是孩子遭受的打击是一样的。”

朱华燕也发现，少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表达了强烈的敌意，并情绪激动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应该对罪犯的子女采取坚决打

压的态度……要让罪犯知道,社会是在歧视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害怕犯罪”。



走进儿童村,孩子们走向了光明

可正如王刚义所说,“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尊重的孩子,对这个社会怎能有责任感呢?”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被救助前,在不少未成年子女心里,“穿着警服的才是坏人”。在由 PFSE(复合)社会企业主办的第二届服刑人员子女社会救助研讨会上,一位长期从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研究的公益人士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例:“当亲眼看到父亲被警察戴上手铐,推上警车后,不到十岁的平平仇视所有穿警服的人。哪怕后来狱警找到他,希望把他带到儿童村,让他更好地生活,换来的是平平拼命地反抗和拳打脚踢。”

2001年,美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率比同龄普通未成年人犯罪率要高得多。而目前在中国,尚无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率与普通未成年人犯罪率进行横向对比的权威公开数据。

让王刚义忧心的是,“在这些孩子的思想中,对司法和法律有着巨大的敌意,再加上亲戚避之唯恐不及,更有来自周围人的歧视,如果救助不及时,被生活所迫的他们很容易在踏入社会后,走上犯罪道路。”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同样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他们还有未来吗?

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发达国家首先以法律形式保障救助工作的开展,并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规定,保障实施到位。例如,美国救助